

●张 觉

《吴越春秋》考

ABSTRACT The authorship of the present version of the "Wu Yue Annals" completed during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25—220) should be, "compiled by Chen Yue, revised and finalized by Huangfu Zun". The reprinted block-printed edition by Kuang Tingrui embodies the best of the style and features of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 of the tenth year of Dade (1306) of Ming Dynasty. It has been for about 700 years that a new annotated edition of it is published.

SUBJECT TERMS History books of miscellanies—Studies

"Wu Yue Annals"—Textual researches

CLASS NUMBER G256.22

《吴越春秋》历来被认为是杂史之要籍，但对它的来龙去脉及其作者，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一致的看法。今不揣愚陋，略作考述。不当之处，敬望方家指正。

一、《吴越春秋》作者考

据史载，赵晔著《吴越春秋》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赵晔的生平事迹，史载甚略。据《后汉书·儒林列传》可知，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年轻时做过县里的小吏，曾让他去迎接郡里来的督邮^[1]。由于他禀性清高，不愿阿谀奉迎，所以弃职不干，到犍为郡资中县（今四川资中）去向当时的经师杜抚学习《韩诗》，潜心于学问，一连二十年也不捎个信回去，家里的人还以为他死了。杜抚死了以后他才回家，州里召他做官，他仍未就职，曾被选举为有道征士。他的著作首推《吴越春秋》，其《诗细历神渊》更为当时的学者蔡

邕所赏识，以为胜过王充的《论衡》。据《隋书·经籍志·经部》著录，他还著有《韩诗谱》二卷、《诗神泉》一卷，但隋唐时已亡佚。史籍未载其生卒年，我们只能根据其事迹稍加推断。他就学杜抚，当在二十岁左右，在杜抚处二十年而杜抚死，当在四十岁左右。据《后汉书·儒林列传》，杜抚建初中（76～83）为公车令，数月卒官。算他死于公元80年左右，由此上推，赵晔当生于公元40年（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前后。他的书曾受到蔡邕（132～192）推崇，想必在他死后不久。由此推测，他可能卒于公元130年（汉顺帝永建五年）前后。这些推测虽不一定精确，但他生活于东汉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和安帝之时（58～125），恐怕是可以肯定的。有人认为他是“后汉建武年间人”^[2]，我以为并不妥当。

赵晔著《吴越春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流传至今的《吴越春秋》，虽都题为赵晔撰，却很成问题。因为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

·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等著录,赵晔所撰的《吴越春秋》是十二卷,而现存的《吴越春秋》却只有十卷,有些本子还将它合为六卷,可见今传《吴越春秋》已不是赵氏原著。《隋书》又著录杨方撰《吴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吴越春秋》十卷。《唐书》也载杨方撰《吴越春秋削烦》五卷、皇甫遵撰《吴越春秋传》十卷。这些著作与赵晔之作是否有关呢?《崇文总目》卷三在著录了“《吴越春秋》十卷”与“《吴越春秋传》十卷”之后加按语说:“唐皇甫注^[3]。初,赵晔为《吴越春秋》十卷^[4]。其后有杨方者,以晔所撰为烦,又刊削之为五卷,遵乃合二家之书考定而注之。”此说若是事实,则赵晔、杨方、皇甫遵三家之作虽不相同,却也有联系。而流传至今的《吴越春秋》十卷应该是皇甫遵的考定本。虽然它的原著者是赵晔,但经过杨方的刊削与皇甫遵的订正,早已不同于原著了。所以,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它是“赵晔撰”。这种情况,与《东周列国志》有相似之处。如果说,《东周列国志》的作者被题为“蔡元放”不太妥当而应该题为“冯梦龙、蔡元放”,那么《隋书》将十卷本的《吴越春秋》题为“皇甫遵撰”也就不太妥当而应该改题为“赵晔、皇甫遵撰”。

据《崇文总目》之说而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否能成立呢?后人议论纷纭。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完全承袭《崇文总目》之说。

徐天祐则认为今传之十卷本为赵晔所著,杨方、皇甫遵之书已不传^[5]。

杨慎则对传世的《吴越春秋》之作者表示疑问。其《丹铅余录》卷十四说:“《汉书》:赵晔撰《吴越春秋》。《晋书》:杨方亦撰《吴越春秋》。今世所行,晔耶?方耶?”

胡应麟则认为今本为赵晔之作,而非杨方之作。他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五《丹铅新录一》中说:“案隋、唐诸《志》,杨方所撰名《吴越春秋削繁》,南渡尚存见。《通考》盖以晔所撰太繁,故芟削之,若刘孝标《九州春秋钞》之类

耳。夫东京、六代文体迥异,即二书并行,岂能惑具眼哉?”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完全承袭杨慎之说而不加论断。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认为今传十卷本为皇甫遵之书。

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认为今传十卷本是杨方之作。

今传《吴越春秋》十卷的作者究竟是谁呢?我认为应该题为“赵晔编著、皇甫遵删定”。

说“赵晔编著”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杨方、皇甫遵的《吴越春秋》,都不过是在赵著的基础上加以删削、考定而成的。所以,今本即使最终出于皇甫遵之手,也不能将赵晔排除在作者之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只题“赵晔撰”。因为今本实非赵氏原著,它与赵氏原著相比,不但被删削了,而且也被改动了不少。这从古代类书与注释的引文中可以得到证实。

我之所以不把杨方当作为今本的作者之一,是因为:《晋书》卷六十八《杨方传》说他“著《五经钩沉》,更撰《吴越春秋》”,这所谓“更撰”,不过是改编而已,究其实,也就是《崇文总目》所说的“刊削”。其书在当时可能是以《吴越春秋》为书名而行世的,所以《晋书》只说他撰《吴越春秋》。但当时赵晔的十二卷本同样流行,正如胡应麟所说,它是不能“惑具眼”的。所以《隋书》、《唐书》的编著者在著录时就不再承袭《晋书》而正其名为《吴越春秋削繁(烦)》。杨方既然以为赵书烦而大加芟削,恐怕是不会再作什么增补的。就是说,他的书不过是赵书的删节本,其中并没有他的创作成果。我们不应该将他视为《吴越春秋》的作者。有人以为杨方对赵书有削也有增^[6],恐怕是不符合事实的。《崇文总目》所谓“遵乃合二家之书考定”,恐怕也只是指取赵晔之书、参照杨方的删削方法加以删定而已。就是说,杨方之书不过是皇甫遵考定时的一种参

考资料,而不是一种原材料。皇甫遵的十卷本,根本不是简单地将杨方的五卷析为十卷、再去其“削繁”之名而成的。他的十卷本,应该是一种较赵书为简而较杨书为详的本子。所以皇甫之书一流行,杨方之书便无甚价值而渐渐地失传了,而决不是后人将杨方的书改题为“赵晔撰”。

我之所以要把皇甫遵当作今本的删定者而著其名,是因为今传之十卷本实即皇甫遵的考定本。它们的卷数相同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证据。另外,皇甫遵本是一种注本,所以《唐书》将《隋书》的皇甫遵撰《吴越春秋》十卷正名为《吴越春秋传》十卷。大概后来的本子删去了他的注,所以又转题为赵晔撰,但其中却不免残留下皇甫本的痕迹。顾广圻、蒋光煦都曾见到过影宋抄本十卷。蒋光煦虽说它“无注”,但从他的校记中可以看到,宋本还残留着一些注释。如卷三:“胥乃贯(‘乌还切’)三字,宋本原注)弓执矢。”卷四:“会楚之白喜(宋本有注云:‘上音伯,下音豁。下文同。’)来奔。”卷六:“化为黄能”^[7]。(宋本有注云:“囊来切,鳖三足。”)这说明,题为赵晔撰的宋本十卷,实出自皇甫遵“考定而注之”的本子。《宋史·艺文志》著录了“赵晔《吴越春秋》十卷”、“皇甫遵注《吴越春秋》十卷”两种本子,其间的区别恐怕只在于注释的有无,原文可能是一样的,即都是皇甫遵考定的十卷本。皇甫遵在考定时,将赵氏的十二卷本删削改动了不少,这一点已为古代类书及古注的引文所证明。所以,宋以后流传的十卷本,如果不题“皇甫遵删定”而只题“赵晔撰”,就不能反映出该书作者的真相与全貌。皇甫遵应被看作为今本《吴越春秋》的准作者而著其名。

需补充说明的是,古代凡抄撮旧史、删削他书、考订校注等皆称“撰”。所以,赵晔抄撮《左传》、《国语》、《史记》以及传闻异说被称为“撰”,杨方删削赵书也被称为“撰”,皇甫遵考定赵、杨二书而加注也被称为“撰”。但真正要确定其作者,是不能不作具体分析的。

二、《吴越春秋》流传考

《后汉书》卷七十九载赵晔“著《吴越春秋》”,可知该书成于东汉。《晋书》卷六十八载杨方“更撰《吴越春秋》”,可见此书到晋代又有了改编本。据《隋书》、《唐书》以及郑樵《通志》卷六十五的著录,可知在隋、唐、北宋期间,此书有三种传本,即赵晔的原本十二卷,杨方的删节本五卷,皇甫遵的参定注释本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上著录“《吴越春秋》十二卷”,并说“右后汉赵晔撰。吴起太伯,尽夫差;越起无余,尽勾践。内吴外越,本末咸备。”可见南宋初年赵氏的原著尚存。《艺文类聚》、《初学记》、《文选》注、《史记》注、《太平御览》等所引之文有不少不见于今本,也可说明唐、北宋时期赵氏的十二卷本并未亡佚。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未著录此书。《宋史》卷二百三也只载“赵晔《吴越春秋》十卷、皇甫遵注《吴越春秋》十卷”,由此可以推知,赵晔所著的十二卷本及杨方所芟削的五卷本在宋末元初都已经亡佚^[8],剩下的就只有皇甫遵删定的十卷本了。清代顾广圻曾见到过影宋钞本,并在乾隆甲寅(1794)九月用它校过明刻本^[9],蒋光煦也曾用影宋本校过^[10]。从他们的校记中可以知道,宋本是十卷本,文字与明刻本稍异,仅有极少几条注释。这种影宋本现在也早已亡佚。

《吴越春秋》现存的最早刊本,是元大德十年丙午(1306)绍兴路儒学刻明修本。这是元代绍兴路总管提调学校官刘克昌支持刊刻的,由前宋国子监书库官徐天祐作序,并加考订音注^[11]。该书今藏北京图书馆^[12],恐怕是孤本了。今未见该书,难以评论。但该板既在明代修过,恐怕与元代的原刻本不尽相同^[13]。

明代有好几种刻本,其中最能体现大德本风貌的有弘治十四年(1501)邝廷瑞、冯弋的翻刻本^[14],共十卷而又分上下。该本现存

虽已不多,但上海涵芬楼1919年辑印《四部丛刊》时影印了此本,所以现在也易见到。此外还有一种明代翻刻的十卷本也甚佳。这种本子每半叶9行,每行17字,其刻书年月及刻书人均未标明,所以莫友芝还以为是大德原版的重印本^[15]。其实它只是明刻本。徐乃昌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将它辑入《随庵徐氏丛书》而校刊印行^[16],其“字画行款,一仍其旧”^[17],所以也可利用。明代万历丙戌(1586)冯念祖卧龙山房也翻刻过大德本,十卷。该本现存尚多,较易见到,可惜误字甚多。明代除了保留十卷本面貌的翻刻本外,又有人将十卷合并为六卷,即将前三篇合为第一卷,第六、第七篇合为第四卷,第八、第九篇合为第五卷。他们虽然保留了徐天祐的注,却删去了徐天祐的序以及书末的衔名,文字也多异同。吴琯辑校的《古今逸史》中的《吴越春秋》,何允中辑刊的《广汉魏丛书》中的《吴越春秋》,都是如此。这两种六卷本也为后人所重,后世翻刻影印者不少,其实不足称善。

清代的刊本不少,但大多是六卷本,如:(一)汪士汉康熙七年(1668)搜罗《古今逸史》残版重加印行的《秘书廿一种》本,其版除卷一至卷五的第一叶有所剜改外,其他与《古今逸史》本同。该书嘉庆九年(1804)重印。(二)于敏中等乾隆三十八年(1773)所辑的《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该本为抄本,今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现也有影印本可供利用。(三)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本,也是抄本。据《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中的《吴越春秋》为十卷本,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的《吴越春秋》却是六卷本,不知他阁是否抄有十卷本。文渊阁本抄校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虽为孤本,但现已影印,流传甚广。该本虽为御制,但误字却不少。(四)王谟乾隆五十六年(1791)辑刊的《增订汉魏丛书》本,该本后来翻刻者甚多,有光绪二年(1876)红杏山房刊本,光绪六年(1880)三余堂刊本,光绪十七年(1891)艺文

书局刊本,宣统三年(1911)上海大通书局石印本等。除六卷本外,清代也有十卷本传世,如:(一)徐维则光绪二十年(1894)所辑的《会稽徐氏初学堂群书辑录》中的《吴越春秋》,该本为稿本,藏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二)徐乃昌《隋庵徐氏丛书》本(见上)。

清亡以来的刊本有:(一)郑国勋1917年辑刊的《龙谿精舍丛书》本,十卷。北京中国书店1982年又用郑氏原版重印过。(二)张元济等1919年编辑影印的《四部丛刊》本(见上)。(三)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丛书集成初编》本,该本据《古今逸史》本影印,六卷。(四)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据冯念祖本(见上)排印的《四部备要》本^[18],十卷。(五)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的《万有文库》第二集《国学基本丛书》本,六卷。(六)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所辑的《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本,该书据《古今逸史》本影印,六卷。(七)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六卷。(八)台北世界书局1986~1988年影印的《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六卷。(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苗麓点校本,十卷。该书以“大德本”为底本,较上述各本之底本为优,但在校点排印中有疏漏,这是很可惜的。

由上所述可知,明代以来《吴越春秋》流布甚广,但其中好的版本并不多,值得称道的当推元大德刻明修本、邝廷瑞本及其影印本(《四部丛刊》本)、明刻9行17字本及徐乃昌校刊本。其他的版本,与大德本的差异就比较多。

前人对《吴越春秋》的注释工作做得不多。皇甫遵的注本在宋末就已亡佚,而自徐天祐音注的大德本问世至今近七百年,还未有过新的注释本问世,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徐注虽解决了不少疑难,但要读通全书,仅依靠他的注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注释

1 督邮是郡守佐吏,主管督察属县的违法之

事,权任甚重。苗麓在《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4月第2版)前言中说赵晔“担任‘督邮’之类的小官”,误。

2 见苗麓校点的《吴越春秋》前言。

3 “唐”字误,《隋书》已著录皇甫遵之书,则此人当在隋代或更早。

4 “十卷”当作“十二卷”,《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崇文总目》作“十二卷”。

5 见《吴越春秋》所载徐天祐序。

6 见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

7.10 见蒋光煦《补阙录》。

8 《文献通考·经籍考》虽也著录《吴越春秋》十二卷、《吴越春秋传》十卷,但不过是抄录了《郡斋读书志》与《崇文总目》,不足徵。

9 见叶昌炽手录在明刻本《吴越春秋》上的顾广圻校语及跋,上海图书馆藏。

11 徐天祐,字受之,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景定三年(1262)进士,时年尚英妙,为大州教授,日与诸生讲经义,听者感发。德佑二年(1276),以文林郎国子监书库召,不赴,退归城南,杜门读书。及文天祥被执以死,徐天祐与王英孙并为衣冠避乱者所宗。四方学者至越,必进谒。天祐高冠大带,议论卓卓,见者咸以为仪刑。参见清曾廉《元书》卷九十一(宣统三年层漪堂刊本),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卷六十四(张寿镛1937年刊《四明丛书》第五集),万斯同《宋季忠义录》卷十四(张寿镛1934年刊《四明丛书》第二集),厉鹗《宋诗记事》卷六十八(乾隆十一年黄氏琴趣轩刊本),陆心源《宋史翼》(光绪三十二年归安陆氏刊本)。以上除《宋诗记事》外,均误为“徐天佑”。《诗经·小雅·信南山》:“受天之祜。”其字“受之”,当名“天祐”,作“佑”者误。

12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3 苗麓点校的《吴越春秋》,即以北京图书馆所藏为底本,其《附录》云:“《徐氏补注》仅见于弘治本。大德本、万历本均无。”按理说,弘治本只是大德本的重刊本,它有《徐氏补注》,大德本也应该有。现在没有,说明该明修本与大德原印本是不尽相同的。还有,苗麓本的目录分十卷而不分上下,如果其所据底本也如此,则肯定也不同于原印本。因为不但邝珣瑞翻刻的大德本目录分上下卷,而且徐天祐在注中也时常说“上卷……”、“下卷……”。这说明徐氏考定的初印本是分上下卷的。今不分,则其书板肯定与原来不一样了。当然,这仅是据苗麓本所作的推测。这些若是苗麓本之误,则当别论。

14 据苗麓校勘记,该本与大德本的异文很少,可见它很能体现大德本的风貌。不过,我将《四部丛刊》本与苗麓本一校,在其校勘记之外又发现很多异文,这或许是苗麓本在排印过程中造成的。

15 见莫友芝写在该明刻本上的跋,上海图书馆藏。

16 徐乃昌所据为该明刻本,《中国丛书综录》说他“据元大德本景刊”,误。

17 此为缪荃孙《随庵丛书》序之语。

18 该本自称据《古今逸史》本校刊,实非。不过,冯念祖本与《古今逸史》本均未善,取以为底本,失当。

张 觉 笔名张倔。1984年复旦大学古汉语专业毕业,硕士。已在64种刊物上发文138篇,出版专著6种。通讯地址:上海市黄兴路2030弄81号,邮编:200433。

(来稿时间:1993-02-16。编发者:刘喜申。)

(上接65页) 规律的研究,后者侧重文献外在规律的研究,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缺少任何一个,文献学的研究都将显得空洞和没有意义。它们共同构成文献学的主要基础理论。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都是文献学学科群中的成员,是文献学发展的基础,又是文献学理论和方法在特定状况下的具体体现。

文献学在我国还很年轻,研究内容繁杂宽广,有待于广大学者共同奉献才智,推动它

的迅速发展。

周文骏 笔名决远。1953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现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图书馆学博士生导师。已发表60余篇,出版专著12种,译著1种。通讯地址:北大信息管理系,邮编:100871。

杨晓骏 1987年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现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研究生。已发文20篇,出版专著3种。通讯地址:北京大学25楼127室,邮编:100871。

(来稿时间:1992-12-15。编发者:翟凤岐。)